



现代译丛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

美国政要论 苏联和东欧



le
of them seen
the "reste
these
the re
ome additional
ional system.
et us first turn to population and terri.
opment of the population (from 1950/51 to
fourteen most populous countries of the world. Th
and as compared to the USA are given in bra

the longest power in the world in 1950. Thus
1966 was 0.25 or 25 per cent of that of t
and its territory 5.8 per cent of the area of th
Looking at the figures one realizes at
the European members of the for
ories of West Germany, France
only to the a
of Brazil and China. Th
Mexico, India
somewhat

时事出版社

现代译丛

美国政要论苏联和东欧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

美国政要论苏联和东欧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

时事出版社

美国政要论苏联和东欧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选编

*

时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万寿寺甲2号)

邮政编码: 100081

北京时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241000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80009-092-2/Z · 09 定价: 4.00元

编 者 的 话

本期选用了几篇有关美国对欧亚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文章，作者系美国有影响的人物和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文章谈及美国促成东欧和平演变的策略以及美国对华政策。有关对华政策的分析显示了美国维护自身利益的盘算和在中国统一问题上的决策过程。

展望世界经济的文章涉及国际经济合作前景以及今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讨论国际安全问题的文章介绍了国际安全问题研究的现状和未来趋势。《企业情报之道》一文概述了当前国外企业从事的情报活动。大部分文章论述有条理，观点清晰，值得参阅。

1989年11月

目 录

· 美国政要论社会主义国家 ·

美国对外策略：布什议事日程

..... 〔美〕理查德·尼克松（1）

美国对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

..... 〔美〕马丁·L·拉萨特（23）

美国在中国统一问题上的作用

..... 〔美〕马丁·L·拉萨特（40）

· 国际经济 ·

21世纪的日本经济及世界经济趋势

..... 〔日〕金森久雄（65）

日本当前的海外直接投资

——全球正迎来投资新时代

..... 日本贸易振兴会（116）

国际经济合作前景

——美日欧在进行积极竞赛吗

..... 〔联邦德国〕克劳斯·乌·格雷乌里希（165）

• 第三世界一瞥 •

私有化：第三世界行动缓慢

..... [美] 约翰·麦克切斯尼 (177)

拉美军人对政府的挑战

..... [美] S·M·利诺维茨 (180)

菲律宾新人民军近况

..... [美] 威廉·查普曼 (189)

• 安全与情报 •

国际安全问题研究：现状与未来

..... [美] 小约瑟夫·S·奈 (208)
..... [美] 肖恩·M·林恩-琼斯

美国在黑海的间谍活动

..... [美] 威廉·M·阿金 (227)

企业情报之道

..... [美] 赫伯特·E·迈尔 (231)

美国对外策略：布什议事日程

〔美〕理查德·尼克松

提要：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急剧改革为推进西方安全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会。美国必须趁机发动政治攻势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第一，重振西欧联盟。第二，在东欧搞和平演变：（一）应加强西方对东欧的宣传和对推进和平变革的人以物质支持；（二）应继续执行区别对待的政策，着力支持那些促使本国走向政治多元化的东欧国家及其领导人；（三）应把东欧置于美苏议事日程上，促使东欧中立化。第三，利用美经济力量，压苏从第三世界撤出。第四，通过军控谈判，削弱苏常规军力优势。

1945年，即温斯顿·丘吉尔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发表演说的前一年，丘吉尔就向新任总统哈里·杜鲁门传递了关于苏联政策不祥发展的信息：“一个铁幕正在他们面前拉下来，我们不知道铁幕后面的情况。因此，极端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应同俄国达成谅解

解，然后再去大规模裁减军队和撤回到我们的占领区。”丘吉尔的建议被忽视了，而且当美国对苏联的讨价还价的力量处于顶峰的时候，西方失去了同克里姆林宫谈妥有利交易的一次历史性机会。

经过近半个世纪之后，共产主义世界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主席在苏联集团内部进行了引人注目的变革，这就使自由世界新领导人乔治·布什总统获得了加强西方安全和促使美苏关系剧变的又一次历史性机会。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和改革”的政策甚至受到西方某些强硬派领导人的称赞，认为这预示着冷战的结束。尽管他的改革使人有理由重新估价西方对苏政策，但我们必须牢记冷战的根源——莫斯科对东欧的控制和在全世界的侵略性对外政策——仍然继续存在。那些要求西方用低息贷款和补贴信贷去“帮助戈尔巴乔夫”的人，并不懂得在戈尔巴乔夫尚未与克里姆林宫过去的政策彻底决裂之前就采取这样的行动是不符合我们的利益的。

现在存在着向更稳定的和平取得真正进展的机会。布什总统如果冷静地观察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并制定出一项使克里姆林宫领导人面对困难战略抉择的政策，那就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必须使戈尔巴乔夫作如下抉择：是与西方建立不那么对抗的关系，还是继续保持对东欧的帝国控制；是继续进行武器竞赛，还是达成可能确立稳定的战略和常规平衡的武器控制协议；是取得西方技术、信贷，还是继续在第三世界进行苏联的冒险行动。

戈尔巴乔夫被认为是苏联新型领导人，因而西方对他兴高采烈。他衣着应时考究，彬彬有礼，待人接物圆通。这种“明星气

质”使记者和外交官们头昏目眩，天真地把风格和言词的改变同实质和政策的改变混淆起来了。我会见过战后苏联的三位主要领导人。他们是尼基塔·赫鲁晓夫（1959、1960年）、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1972、1973、1974年）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6年）。戈尔巴乔夫是个别具一格的人物。在坚韧和顽强方面，他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不相上下。但在现实性、敏捷和智慧方面，则超过他们。他的果敢、勇气和精通公共关系应得到人们很大的尊敬。从西方的观点来看，他虽是一位不同类型的领导人，但不一定就是更好的领导人。我们必须记住他的才能既能促进全球安全，同样也可轻而易举地使世界成为更加危险的地方。

戈尔巴乔夫之所以着手进行改革和对西方奉行较为妥协的方针，是因为共产主义经济制度在国内已失败和苏联对外政策在国外碰了壁。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中央计划经济成了腐败和效能差的标志。勃列日涅夫的黠武作风和扩张主义不仅动员西方加强其军队，而且使苏联在狼吞虎咽吃下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之后患了帝国消化不良重病。到80年代初为止，莫斯科在阿富汗、古巴、尼加拉瓜、越南、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扶植的傀儡，为保持自己的权力每年至少要使克里姆林宫花费200亿美元。如果认为只有戈尔巴乔夫才会搞改革计划，那是错误的，因为这些实际情况会迫使任何掌权人去重新构想苏联的内外政策。

戈尔巴乔夫不像其前任，他看世界是不带意识形态的。他现实地估计了苏联在经济、政治、帝国和地缘政治等方面所存在的极严重的问题。

第一，他公开承认苏联经济自70年代末以来处于增长率微不足道、甚至出现负增长率的停滞状态。如果不进行经济改革和取得西方的技术和资金，那么，苏联将绝望地落在美国、西欧、日本和也许到下个世纪中叶的中国之后。

第二，戈尔巴乔夫着手进行经济改革是因为他认识到苏联人民的热情再也不能用政治口号来激发了。缓和时代东西方接触的增加和宣传媒介的革命使斯大林式的孤立和思想灌输的战略失去效用。今天，苏联人民了解到他们的生活水平——狭窄而拥挤的住房、购买食物时没完没了的排队和商店中空荡荡的货架——不仅不堪与西方相比，而且同第三世界新兴工业国家亦难以相比。戈尔巴乔夫知道只有物质刺激而不是意识形态劝诫才能激发人民更加努力工作。唯有人民实际上能用他们挣得的更多的卢布来购买像样的消费品时他们才能增加生产。

第三，戈尔巴乔夫知道经济失败和政治镇压已经在整个苏联帝国造成了日益鼎沸的动乱气氛，只要有一个小小的起因，这种动乱就可能爆发。定时炸弹就在地表层下面，随时都有可能爆炸。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他的几乎所有卫星国中，而且还存在于苏联自己的许多非俄罗斯族加盟共和国中。他力图通过公开性制造一种安全阀门，来缓和这种被抑制的沮丧情绪，但是，他使这种愤怒情绪发泄出来，也许就像把妖怪从瓶中放出来一样。他将会发现东欧对多元化的要求和非俄罗斯族对扩大民族自治的要求是难以控制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领导人曾利用民族主义的吸引力把自己的帝国扩张到第三世界中去，而现在，民族主义势将使这个帝国四分五裂。

第四，当戈尔巴乔夫纵观全球政治情景时，他必定会感到吃惊：克里姆林宫的对外政策不是提高了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反而使世界上所有大国联合起来反对莫斯科。美国、加拿大、西欧、日本和中国（总计占世界经济的60%以上，它们在世界任何冲突中都会使苏联遇到两条阵线作战的威胁）在反对莫斯科传统的扩张主义野心方面进行长达十五年以上的积极合作。莫斯科的旧思维已穷途末路，因此，戈尔巴乔夫才在外交上提出他的“新思维”，用以松弛和瓦解反苏集团的这种联合。

第五，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本能地相信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但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苏联在这场斗争中已经失败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即不仅在苏联集团内，而且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人们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是条走向停滞而不是繁荣的道路。他对那些想夺取和保持政权的人仍然有吸引力，但对那些想为其人民缔造更美好生活的人来说已没有吸引力了。戈尔巴乔夫想通过他的改革，力求为社会主义确立一种新的模式和形象，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施以回春之力。

三

戈尔巴乔夫的目标是振兴本国的共产主义制度，以便使苏联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如果不广泛地进行改革，他就不可能承受苏联军队和苏联仆从国的费用，就不可能改善苏联人民的生活，就不可能创造出一种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能有竞争力的模式，就不可能使苏联继续处于世界大国的前列。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国内面临着有可能使他的努力败北的三大障碍。尽管他在最近召开的党的特别会议（1988年6月）上取得了成功和在最近的中央委员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施出了绝招，但他对苏维埃制度的政治控制并未牢固。在12个政治局委员中，能够指望的坚实盟友只有三四人。尽管他的明显对手叶戈尔·利加乔夫，也许再也不会作为公认的第二号人物威胁着戈尔巴乔夫，但是，利加乔夫的一派正在一旁等待着，一旦戈尔巴乔夫犹豫畏缩，他们将随时取而代之。苏联最后一个改革者——尼基塔·赫鲁晓夫在威胁了过多的顽固利益集团时，就在政治上过早地垮台了。

因此，我们不应为戈尔巴乔夫作出我们不愿向丝毫不进步的

苏联领导人作出的那种让步，因为仍然存在着后者上台的可能性。虽然戈尔巴乔夫被誉为世界舞台的超级明星，我们务必记住，发光最亮的星有时消失得最快。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四年中，话讲得不少，但进展甚微。他无力使苏联僵化的党政官僚机构放弃斯大林主义方式。他要完成关于教育老官僚们采用新方法的艰巨任务。告知某个官僚分子去完成某项任务是一回事，而命令他变成富有创造性和革新精神的人是另一码事。前者至少激励他去行动，而后者会使他由于完全不理解而茫然不知所措。

戈尔巴乔夫最大的问题是他仍然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他在政治和组织斗争中赢得了胜利，但是，这个不利条件注定最终将使他的改革破产。经济迅速而持续的增长，只出现在那些尊重个人拥有私人财产和允许物价不受管制的、让供求规律来进行经济资源分配的国家。戈尔巴乔夫已表示要把土地长期租给农民私人经营的愿望和指出某些价格到90年代初将解除管制，但他仍想牢牢保持党政机构对整个经济的指挥权。经济从资本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例子倒有一些，而经济从共产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例子连一个也没有。也从来没有人在市场经济和指令性经济之间建立一个有效的中间性结构。

戈尔巴乔夫面临着一大哲学难题：他可以选择意识形态，或者选择进步。如果他选择共产主义，他就不可能进步；如果他选择进步，他就不能搞共产主义。他只有放弃作为其权力基石的意识形态，才能取得堪与西方相比的进步。

鉴于中央计划体制效率差和价格体制不合理，外国投资者今天根本无法判断在苏联值得冒什么经济风险。向克里姆林宫贷款就像把赌注押在掷骰台上一样，有些赌注也许会得到报偿，而另一些赌注，从长期看，将是把金钱浪费掉。事实上，在经济改革尚未成制度以前，西方就提供经济援助，甚至也不符合戈尔巴乔

夫的利益。任何银行家决不会帮助一个他会使其成为不良贷款者的借债人。我们不应使克里姆林宫能够依靠借贷来摆脱今天的问题，从而推迟解决这些问题的起因的必然时刻的到来。

无论是美国的超级鹰派还是超级鸽派，都过高地估计了西方政策对苏联可能产生的影响。超级鹰派认为西方的军事设施及其对苏联在阿富汗等地进行侵略的反对是促使戈尔巴乔夫搞改革的主要因素。西方的那些行动，就其本身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即使不采取那些行动，戈尔巴乔夫也要进行变革，因为苏联的经济制度得了致命绝症。像中国领导人1985年对我说的那样，苏联如不进行改革，到下世纪中叶，它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将会“消失”。这就使内部改革成了非常紧迫的行动而不管西方的政策如何。

另一方面，超级鸽派认为，我们应当尽力去帮助戈尔巴乔夫以促进和平。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不管他是成功还是失败，最终取决于我们无法施加影响的苏联内部的各种事态发展和力量。我们无法规劝戈尔巴乔夫抛弃困扰他的那种由国家主宰经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无法强行促使苏联的官僚体制得到改善。我们甚至在事后还几乎弄不清克里姆林宫政治争斗是怎么回事，更不必说会给那些似乎在观点和利益上同我们相似的人伸出援助之手了。

总之，我们必须正确观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他并不想彻底推翻苏维埃制度，而是想加强它。如果从另一角度来解释丘吉尔说的话的含义，那就是戈尔巴乔夫不会成为让共产党死亡的总书记。我们对他的改革成功感到兴趣，仅仅是因为他们改革这个制度使之对我们的安全和利益的威胁小了一些。我们应当欢迎公开性和改革，但不应为之付出金钱，因为如果他的改革并非不可逆转地改变苏联的对外政策，我们就将是用钱助长那种毁灭掉我们自己的威胁。

四

现在，那些鹦鹉学舌般地喊着“冷战结束了”这一时髦口号的人，忽视了西方的安全问题。戈尔巴乔夫的公共关系专家们已使西方决策人忘记了这样一点：苏联较温和的形象并不意味着苏联有较温和的对外政策。其结果是，到莫斯科去的竞赛已经开始。最近几个月，西方领导人乘喷气式飞机到克里姆林宫去，并带着整机整机的热心的银行家和企业家，而苏联领导人美滋滋地轻易得到了100多亿美元的信贷。除非西方回头和制定出首尾一贯的战略，不然，我们就会挥霍掉讨价还价的力量，并丧失掉苏联事态发展所提供的历史性机会。

我们应当记住当时英国驻澳总督费尔德·马歇尔·斯利姆1953年对我说的一番话。他说，他赞成美苏之间对话，“我们必须打破冰层。如果我们不打破它，那么，我们都要被冻在里面，而且冻结得是如此之牢固，只有用原子弹才能把它炸开。”今天，冰层甚至在冬季尚未结束之前就已经破裂。我们正亲眼看到带来春的气息的消融现象。尽管现在是一个存在着巨大可能性的时期，但我们必须谨慎对待，否则，就要冒坠入冰水中去的风险。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比四十年前冷战爆发时远为复杂。在那个时候，斯大林的铁幕及其战争不可避免的好战言词的威胁是很清楚的。所有这一切使杜鲁门总统能够制止美国恢复孤立主义，使他能采取遏制政策，使两党支持缔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把平时时期的防务开支增加到空前规模。

戈尔巴乔夫出色地改变了竞赛。在欧洲，他放弃了苏联外交恐吓和军事威胁的战术，转而采取欺骗宣传和玩弄政治花招的战术。他用外交奸计代替武力威胁，以此作为他进行外交征服的上

策。因此，当苏联在常规军力和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准确性方面的优势比以往增加的时候，他向苏联分裂北约联盟这个传统目标所取得的进展比任何前任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仅仅就莫斯科红军的军事威胁大声疾呼地发出警告并不能抵挡住他的“和平攻势”。相反，我们必须发动我们自己的政治攻势，以达到我们的战略和地缘政治目标。

我们将是在一个多极的世界中追求这些目标。日本已经成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它必将利用其经济影响来要求发挥政治作用。西欧，到1992年将成为一个统一的经济市场，在政治和战略问题上正开始增加其合作。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核大国，很快就会在经济上变成一个重要角色，到下一个世纪，它将以世界超级大国的面貌出现。

我们能够比戈尔巴乔夫更容易地同所有这些新兴强者合作。因此，美国新政府应当在同我们的主要盟国和朋友进行深入讨论和会晤之后，才应同戈尔巴乔夫举行实质性的最高级会议。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不使莫斯科遇到一种敌对的、好斗的统一战线，而是尽可能地去探究我们的共同利益和协调我们的政策。

布什总统应当继续拒绝一些人所提出的建议，这些人要求他安排与戈尔巴乔夫迅速举行首脑会议，以便在他的任期之初就取得外交政策“胜利”。戈尔巴乔夫对首脑会议的需要远甚于布什总统。只有当布什政府在战略上同我们的盟国取得一致并制定出能取得实质性的重大进展的明确计划时，布什总统才能确定苏美首脑会议的日期。

在战略制定过程中，我们应当从对戈尔巴乔夫想要些什么作估计开始，然后确定出我们需要些什么，有可能进行些什么样的交易，以及为压他同意我们的条件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得承认，挂钩——一个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同另一个问题上的进展的关联——是同莫斯科进行任何成功的谈判的关键。克里

姆林宫领导人常常会公开地拒绝挂钩，但他们又往往会暗暗地接受挂钩。

如果不挂钩，戈尔巴乔夫就会在讨价还价的谈判桌上轻而易举地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每个超级大国对某些问题上取得某些进展的兴趣大一些，同时对另一些问题上取得进展的兴趣小一些。譬如，戈尔巴乔夫大力争取进入西方资本市场和取得西方技术。另一方面，美国更大的兴趣是通过解决一些威胁我们利益的地区冲突来削弱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影响。莫斯科更愿意仅仅谈判前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去奉行坚定的挂钩政策，戈尔巴乔夫就会左右议事日程，并在他置于优先地位的问题上取得单方面进展。

要挂钩就需要巧妙行事。一个美国总统不应在电视上公开宣布他打算把下一个军备控制协议当作要挟苏联在这一或那一问题上作投降的“抵押品”。美国国会也不应当犯那种把美国对外政策目标同苏联国内改革公开挂钩的错误。1973~1974年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即为一例。这个修正案的目的在于强迫苏联增加犹太人向外移民人数，但效果适得其反，移民数量锐减。我们应当在国际讲坛上有力地迫使苏联人去消除自己践踏人权的现象。而且我们必须让他们觉得这样做显然是出于自愿，而不要笨拙地弄成这样一种状况：他们这样做似乎只是由于西方对其内部事务直接进行了干涉。看来，没有一个大国会允许自己的对内政策由外国力量来指使。

我们应当把改善东西方关系的进展同苏联在全球行为的克制挂起钩来。如果我们不顾苏联直接或间接的侵略而达成有利于莫斯科的协议，那我们事实上就是给克里姆林宫打开绿灯，允许他们伤害我们的利益。如果我们执行一种包括挂钩在内的坚决战略，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促进我们在欧洲、在军备控制谈判以及在世界关键性地区冲突中的战略利益。

五

欧洲再次成了东西方冲突的重要焦点，而我们对苏联人的战略必须改变以适应这种情况。从1945年到60年代初，欧洲大陆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舞台。从60年代初直到80年代中期，即欧洲的分裂成了牢固的现实之后，冲突的主要战场在第三世界，如印度支那、中东、南非、非洲之角、西南亚和中美洲等。现在，戈尔巴乔夫又把“旧世界”变成了他的新的对外政策的重要重点和目标。

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传统目标一直是在美国和西欧之间制造分裂，以削弱联盟的力量。莫斯科在不同时期都在追求这一目标。它或者通过对抗战略，力图引起欧洲人的极度恐惧和表明美国作为一个盟国并不可靠；或者通过与美国一起进行共同治理的战略，力图造成超级大国正在决定欧洲命运的印象，以削弱欧洲人的信心。戈尔巴乔夫已采取了直接向西欧人呼吁的更直截了当的战术。他号召建立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一座“欧洲大厦”（言外之意是美国是和平的一个障碍）和谋求利用西欧在东西方冲突长达四十年之后感到的疲乏。

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时的世界与1989年的世界是很不相同的。在欧洲，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战略——即不仅通过使西欧联盟恢复活力的主动行动，而且还要通过持续的努力促进东欧和平变革和政治上的积极演变，来加强欧洲大陆的稳定。

美国新政府应当使欧洲成为其对外政策的头等重点。它应当要求召开一次重要的首脑工作会议——不带黑领结、不带夫人——以便制定出促进我们集体安全的战略。

首先，我们应当就苏联在欧洲军事威胁的性质清楚地作出共同的分析。美国人以及许多欧洲人认为，苏联的威胁仍同以往一样